清史纂修

清代翰林院庶吉士人数考辨

邹长清

翰林院庶吉士制度是清代重要的选拔人才、培养人才的制度，对清代政治、文化诸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本文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，对清代翰林院庶吉士人数进行探讨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问题的提出及统计的依据

有关清代翰林院庶吉士人数，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统计数据：

1、吴建华的统计："清代庶吉士是经过正常馆选和非常改选的两条途径产生的"，"统计清代正常馆选的庶吉士从 1646—1904 年共 6052 人"。①

2、吴仁安的统计：根据钱实甫编著的《清代职官年表》四册统计分析，清代庶吉士总数是 6216 人。②

3、李润强的统计：依据"清代历科《进士题名碑录》、《进士题名碑》拓片、清历朝《实录》、《清史稿》、《清文献通考》及其《续考》。《实录》中明显有误的数据，本人作了补正。"结论："清代庶吉士总人数，为 6065 人，其中非进士出身的，如博学鸿儒、翻译进士等，共约 200 人，庶吉士实际由进士出身者，为 5865 人。"③

4、邸永君的统计：从顺治三年（1646）至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，清代共行会试 112 科，馆选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光绪十八年，为 99 人，最少的一次是顺治十八年，为 10 人。"清朝一代共考选庶吉士 5742 人（其他途径所授庶吉士不计在内）"。④根据是朱汝珍的《词林辑略》。

以上除吴建华外，均说明了统计的资料来源。根据不同的文献，得出的数据自然就有差别。因此，很有必要探讨以什么文献来统计庶吉士人数比较可靠这一问题。

专门记载清代庶吉士名录文献，大致可分官方记载、私家记载两类。官方记载有《词林典故》、《皇朝词林典故》（又称《续纂词林典故》）等两种，前者记载到乾隆十年（1745），后者记载到嘉庆十年（1805）。据这两部官修史书无法统计有清一代庶吉士之总数。私家记载分两个系列：一是《馆选录》系列；二是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系列。沈廷芳编纂的《馆选录》，庶吉士题名记载到乾隆十年止。此后多次续修，直到宣统年间。这一系列记载的馆选名单相对完

［收稿日期］2013－01－09

［作者简介］邹长清（1965—），男，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；桂林 541001；zouchangqing6565@163.com

① 吴建华：《清代庶吉士群体简析》，《社会科学辑刊》1994 年第 4 期。

② 吴仁安：《明清庶吉士制度述论》，《史林》1997 年第 4 期。

③ 李润强：《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 80、93 页。

④ 邸永君：《清代翰林院制度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97 页。

整。《馆选录》系列仅记姓名、籍贯，不记散馆授职等情况。由于我们研究庶吉士制度，不仅要统计庶吉士总数，而且要统计散馆授职情况，因此，不以此书为统计的底本，而只作为参照本。这一系列漏了一名庶吉士，待考的有一名。俞陈琛，是康熙九年（1670）庚戌科庶吉士。① 沈廷芳编纂的《馆选录·特授改补馆职》中有“俞陈琛”，而续修的《馆选录》，康熙九年庚戌科、特授馆职中均漏了“俞陈琛”。殷元福，是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庶吉士。② 沈廷芳编纂的《馆选录》载：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最后一人是“殷元福，河南新乡人”，而续修的《馆选录》在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中则加按语：“是科选庶吉士自汪俟至法海止三十九人，旧录末尚有殷元福，河南新乡人，今姑从阙疑。”不知因何缘故，续修的《馆选录》出现这一失误。

吴鼎雯编纂的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，庶吉士题名止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，此后有多种续修本。据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多种版本的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可知，其中最晚的版本是庶吉士题名止于咸丰九年己未科。这一系列嘉庆七年壬戌科漏了“陈声遹”一人。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只能用作统计庶吉士总数的参照对象。

清末民初朱汝珍编纂的《词林辑略》，是庶吉士题名文献的集大成者。《词林辑略·启》对编纂的缘由和内容作了交代：

> 自有科目以来，世以词林为华选。明清两朝宰辅大半由此登庸，而一代人文亦以此为渊薮。清代膺是选者具载仁和沈氏所辑《馆选录》（自有沈辑，厥后逐科增入），顾仅载庶常姓名籍贯，不及其他。固始吴氏据《词林典故》辑《馆选爵里谥法考》，较沈辑为详。仁和许氏及同馆诸人又有续辑，然仅载至道光辛丑科止，以后未有续者。清远朱隘园太史虑年久无征，锐意辑补，姓名、人数悉根据实录、政纪，字号、官阶则询访故家，旁搜志乘，数阅寒暑，始成是编。自道光甲辰迄科举停止，并游学毕业考试得馆选者，悉载靡遗，且于历官下增载著作，尤足补诸书所未备。③

可见，《词林辑略》一书是在吸收《馆选录》、《词林典故》、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等书的体例和内容基础上而成书的。该书记载有清一代庶吉士的姓名、籍贯、散馆授职等情况。我们以此书作为统计庶吉士人数的底本。当然此书也存在把个别非庶吉士当作庶吉士的情况。

由于清代存在补点庶吉士的情况，而清前期补点庶吉士之事，实录却没有记载④，因此，仅依据《清实录》统计不出清代庶吉士之总数。

《清代职官年表》中的《会试考官年表》列了各科庶吉士人数。但此书有些科年的庶吉士人数与《清实录》、《词林辑略》等书有出入，如同治元年壬戌科庶吉士人数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

---

① 康熙九年馆选名单中有“陈琛”，无“俞陈琛”（见《清圣祖实录》卷33，康熙九年四月乙卯）。康熙九年进士题名碑中有“陈琛”，无“俞陈琛”。庶吉士散馆授职名单中有“俞陈琛”，而无“陈琛”（见《清圣祖实录》卷56，康熙十四年七月戊戌）。《国朝历科题名碑录》康熙九年进士中有“俞陈琛”，无“陈琛”。裘琏等纂修康熙《钱塘县志》卷10在康熙八年举人陈琛之下，作注：“本姓俞。”结合《清圣祖实录》、康熙九年进士题名碑、《国朝历科题名碑录》、康熙《钱塘县志》等史籍、碑刻所载，我们得出结论：康熙九年庚戌科进士陈琛，在入选庶吉士之后复姓“俞”，因此，散馆时，其姓名已是“俞陈琛”。江庆柏对“陈琛”改名“俞陈琛”作了考证（见《清朝进士题名录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176页）。总之，俞陈琛（原名陈琛）是康熙九年庚戌科庶吉士。

②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163（康熙三十三年四月庚辰），张廷玉等纂《词林典故》卷8，朱珪等纂《皇朝词林典故》卷50，吴鼎雯纂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卷3等处记载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庶吉士中均有殷元福。因此，可以说殷元福是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庶吉士。

③ 朱汝珍辑：《词林辑略·启》，民国年间中央刻经院刻本。

④ 《清实录》所记的馆选名单中无陈梦球、帅念祖，也没有记载他们何时补点为庶吉士的。据王士禛所记，陈梦球在康熙三十三年五月补点为庶吉士（见王士禛《居易录》卷23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69册，第597—598页）；据阮葵生所记，帅念祖在馆选后补点为庶吉士（见阮葵生《茶余客话》卷2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138册，第57页下栏）。

六月，引见新进士，钦点了49名庶吉士。同治三年十一月初七日，“补行引见壬戌科进士朱逌然，得旨：著改为翰林院庶吉士”①。加上补点为庶吉士的朱逌然，同治元年壬戌科共选拔50名庶吉士。《词林辑略》记载也是50名庶吉士（包括朱逌然），而《清代职官年表》此科仅49名庶吉士。另如《清代职官年表》明显将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74名庶吉士，错为24人。因而不能用《清代职官年表》来统计庶吉士总数。

我们统计庶吉士总数的方法是：以《词林辑略》为底本，结合《清实录》，参照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、《馆选录》、《词林典故》、《皇朝词林典故》等，进行统计，同时结合《清代起居注册·康熙朝》②、《雍正朝起居注册》以及清代的历史笔记、方志、年谱等文献来加以考证。

据《词林辑略》统计，从顺治三年丙戌科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共馆选了5766名庶吉士（包括43名翻译庶吉士③，不包括因修《四库全书》、校对《四库全书》而被钦赐庶吉士的9人）。《词林辑略》将二甲、三甲进士直接授职翰林官的也当作庶吉士，顺治三年丙戌科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馆选的庶吉士实际并没有5766名。清代到底有多少名庶吉士？

二、对有争议之庶吉士之考察

（一）王彦是否是《馆选录》等书没有收录的庶吉士？

康熙八年（1669）六月初七日，康熙帝谕吏部、兵部、刑部：

近审鳌拜家人罪案，据洪善、尼满供出总督白秉贞、原任巡抚张自德、尚书龚鼎孳、庶吉士王彦、阿达哈哈番金鼎、骁骑校高胡子、正红旗姓高之官，伊等俱曾嘱托行贿，本当严究，从重治罪，但思此等嘱托行贿者尚多，非止伊等，朕已有谕旨，将内外各官苟图幸进作弊者，俱从宽免，今供出各官，亦俱从宽免罪。④

这一史料提到庶吉士王彦，而《馆选录》等书均没有收录庶吉士王彦。庶吉士王彦是否是《馆选录》等书所漏收？

庶吉士制度确立于明代，清朝一直推行。明清两代从二甲、三甲进士中选拔庶吉士，一般没有非进士入选庶吉士之例，唯一例外是乾隆元年举行博学鸿词、二年补试博学鸿词，先后将仅有拔贡、监生、附生等身份的七人授为庶吉士。据此，我们断定庶吉士王彦应是从进士中选拔出来的，但从《进士题名碑》、《国朝历科题名碑录》、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等进士题名资料中均找不到“王彦”此人。因此，我们推断王彦应是某庶吉士之改名。

结合朱珪等修《皇朝词林典故》、吴鼎雯著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、朱汝珍辑《词林辑略》、《清实录》等典籍，可知：

第一、顺治十八年之前姓王的庶吉士全部散馆授职。

第二、康熙三年甲辰科未散馆的仅黄彦博一人。

第三、康熙六年丁未科庶吉士全部散馆授职。

正是通过这一考察，我们推测王彦可能就是黄彦博之改名。

《皇朝词林典故》、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、《词林辑略》等资料记载：黄机，浙江钱塘人，散馆授编修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。黄彦博，黄机子，浙江仁和人。

---

① 《清穆宗实录》卷120，同治三年十一月甲辰。

② 《清代起居注册·康熙朝》（影印本），2009年，分别由中华书局（北京）、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（台北）将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康熙朝起居注出版。

③ 翻译庶吉士是从翻译进士中选拔出来的，他们与其他庶吉士一同入翰林院学习。因此，我们将翻译庶吉士也列入翰林院庶吉士之列。清代翻译庶吉士的人数参见拙文《清代翻译庶吉士制度研究》（《历史教学》2010年第20期）。

④ 《清圣祖实录》卷30，康熙八年六月戊辰。

清国史馆所修《黄机传》：黄机，顺治十七年，擢礼部右侍郎；康熙五年，转礼部左侍郎；六年三月，擢礼部尚书；七年，转户部尚书；八年四月，转吏部尚书。十年四月，“给事中王曰温疏言：‘已故庶吉士王彦实系机子黄彦博，抱病卧邸，即选庶常，机为大臣并未检举，请罪，应黜罢，以为徇私者戒。’机以其子黄彦博与庶吉士王彦姓名既不相同，且彦博病故已久，何敢以姓名不符之人妄认己子，而请罪乎？具疏辨释。十一年二月，以迁葬乞假归。十二月，御史宁尔讲劾机自知清议不容，乞假归里，今假满在即，势必腼颜赴补，请将科臣王曰温所劾黄彦博事穷诘实情，明正其罪。疏下吏部，以事已结案，寝议。”①

王曰温，康熙六年进士，入选庶吉士，康熙八年六月二十八日，散馆，授职科道官，而因行贿鳌拜的尚书龚鼎孳、庶吉士王彦被降旨宽免的时间是康熙八年六月初七日。这表明，庶吉士王彦有可能与庶吉士王曰温一同散馆，但王彦在病故前没有散馆授职。据王曰温之参奏，我们理解王彦（或黄彦博）选为庶吉士，但长期抱病在家，不赴翰林院学习，有违庶吉士之职责。王曰温可能没有见过王彦（或黄彦博），但也不排除见过面，甚至曾一起学习的可能性。② 即使王曰温没有见过王彦（或黄彦博），但由于黄彦博和王曰温分别是康熙三年甲辰科、康熙六年丁未科庶吉士，是上下科庶吉士之别，因此，作为下一科的庶吉士王曰温对上一科的庶吉士黄彦博应有所了解。何况康熙三年甲辰科、康熙六年丁未科庶吉士分别只有 15 人、12 人。人数少，更容易相互了解。总之，王曰温参奏黄机，指出“已故庶吉士王彦实系机子黄彦博”，应是有一定根据，而不是捕风捉影。但黄机却矢口否认此事。黄机在否认王彦是其子黄彦博时，提到黄彦博已经病故，但回避了庶吉士王彦是谁的问题。王曰温参奏中提到已故庶吉士王彦实系机子黄彦博。这就说同一时期的庶吉士王彦、庶吉士黄彦博均已病故。难道是巧合？可能是黄机为保住官位而加以否认王彦是黄彦博这一事实。

宁尔讲，顺治十六年进士，庶吉士，顺治十八年散馆授监察御史。宁尔讲接着参奏也暗含王彦是黄彦博之意。当然这种推断也有不足之处。顺治十七年，黄机升任礼部右侍郎，康熙五年转本部左侍郎，六年三月擢礼部尚书。从这一角度看，黄机已官至侍郎、尚书，其子黄彦博再改名王彦，有点不可思议。按常理，一些人在中进士之后改归本姓归宗，即所谓的“复姓归宗”；作为大臣之子的黄彦博，不存在复姓归宗的问题，而改为他姓，确实不合常理。

总之，根据以上史料，推断王彦很可能就是黄彦博，但由于缺少直接的证据，加上作为大臣之子改为他姓，就不合常情，因此，王彦是否就是黄彦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。③

（二）康熙九年庚戌科庶吉士中有无“陈瑄”？

《国朝馆选录》、《词林典故》、《词林辑略》三书的康熙九年庚戌科庶吉士名录中均记载：陈瑄，四川大竹人。而《清圣祖实录》、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、《皇朝词林典故》三书的康熙九年庚戌科庶吉士名单中均无“陈瑄”，《清圣祖实录》的散馆名单中也无“陈瑄”。

陈瑄是否是庶吉士？

沈廷芳所辑《国朝馆选录》，是清代最早的庶吉士题名录。《词林典故》中的庶吉士题名完全来自《国朝馆选录》。这两书所载康熙九年庚戌科庶吉士中有“陈瑄”，《词林辑略》据此也记载康熙九年庚戌科庶吉士中有“陈瑄”。

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最早的版本庶吉士题名止于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，《皇朝词林典故》

---

① 李桓辑：《国朝耆献类征》卷 3《宰辅三・黄机传・国史馆本传》，第 4 册，第 93—95 页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，1990 年。《清史列传》卷 5《黄机传》，也是辑自清国史馆所修《黄机传》；蔡冠洛编纂《清代七百名人传》卷 5《黄机传》的内容也主要来自清国史馆所修《黄机传》。

② 清代翰林院庶吉士有留馆再学习三年之例，也有因请假来不及参加本科庶吉士散馆的，而与下科庶吉士一起学习、散馆。

③ 最有力的是黄机的家谱或族谱来加以证实。希望感兴趣的学者能加以证实。

庶吉士题名止于嘉庆十年乙丑科。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所载康熙九年庚戌科庶吉士中无“陈瑄”，《皇朝词林典故》很可能参照了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，因此，所载康熙九年庚戌科庶吉士中也无“陈瑄”。由于在清代有补点庶吉士之举，加上有清一代有部分庶吉士没有散馆，因此，我们不能凭《清圣祖实录》中的馆选名单和散馆名单，就断定康熙九年庚戌科庶吉士中无“陈瑄”。

可见，据以上六种文献难以判断康熙九年庚戌科庶吉士中有无“陈瑄”。我们再来考察地方志所载：

《（道光）大竹县志·选举志》记载：康熙九年庚戌科：“陈瑄，翰林院编修。”①

《（道光）大竹县志·垄墓志》：“（清代）进士陈瑄墓在石仓嘴。”②

《（民国）大竹县志·选举志》：“陈瑄，康熙庚戌科，钦点翰林院，授职编修。”③

《（民国）大竹县志·舆地志》：“（清代）进士陈瑄墓在月华场石仓嘴。”④

查阅《国朝历科题名碑录》、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等文献可知，清代四川名叫陈瑄的进士仅一人，因此，可以断定道光、民国两部地方志提到的翰林院编修陈瑄与进士陈瑄应是同一人。

道光《大竹县志》没有提到陈瑄是庶吉士，而民国《大竹县志》则记载：“陈瑄，康熙庚戌科，钦点翰林院，授职编修。”清代庶吉士是由皇帝钦点，因此，俗称选拔庶吉士为“点翰林”。“点翰林：科举用语。（清朝）殿试朝考后，新进士之入选翰林院庶吉士者，称为点翰林。”⑤“钦点翰林院”应是“点翰林”之意。这就是说民国《大竹县志》一书认为陈瑄是翰林院庶吉士。

道光《大竹县志》没有说陈瑄是庶吉士，而民国《大竹县志》则说陈瑄点为翰林（即入选庶吉士），不知其根据何在？可能修志者是在参照了道光本《大竹县志》，并翻检了《词林典故》等文献后，才记载陈瑄钦点为翰林。因此，不能据其所记就能断定陈瑄是庶吉士。

虽然不能断定陈瑄是庶吉士，但我们推测几种可能：

（1）属于补点庶吉士，没有散馆授职。康熙、雍正年间补点庶吉士陈梦球、帅念祖两人在实录馆选名录中缺，但散馆授职中有。我们推测陈瑄有可能属于补点庶吉士。这一推测的不足是，《馆选录》的最初版本把补点庶吉士的名单放在特授馆职中，续修的版本则将补点庶吉士放到相应的各科庶吉士名录中，而《馆选录》各种版本则一直将陈瑄放在康熙九年的庶吉士名录中。（2）陈瑄可能是年老进士，没有选为庶吉士，只是赏以翰林职衔。（3）将陈瑄错记为庶吉士。

总之，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，难以断定陈瑄是庶吉士。

三、直接授职翰林的二甲进士

（一）雍正元年癸卯恩科：张廷珩

雍正元年（1723）十一月二十二日，雍正帝谕内阁：“第一甲第一名于振著即授翰林院修撰，第二名戴瀚、第三名杨炳，即授编修。二甲第一名张廷珩，即授检讨，俱著在南书房行

① 蔡以修等纂修：《（道光）大竹县志》卷27《选举志·进士》，道光壬午刻本。

② 《（道光）大竹县志》卷36《垄墓志》，道光壬午刻本。

③ 陈步武、江三乘等纂修：《（民国）大竹县志》卷8《选举志·进士》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380号，第615页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影印本，1976年。

④ 《（民国）大竹县志》卷1《舆地志·垄墓》，华中地方第380号，第163页。

⑤ 朱金甫、张书才主编：《清代典章制度辞典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474页。

走。”①

张廷玉记载：“（雍正元年）十月，殿试开列读卷官。廷玉以子弟应试例不列名。上曰：‘尔公正无私，不必引嫌回避，仍著读卷。’随与诸大臣秉公校阅取定甲乙，照例以前十卷进呈御览。上阅至第五卷大为嘉赏曰：‘此卷应置一甲，奈何拟为第五。’廷玉奏曰：‘此臣弟张廷珩卷也。’上遂开视弥封，意欲拔置一甲。廷玉奏曰：‘张廷珩乃从回避官生中续取中式者，正榜无名不应居一甲。’上点首，命置二甲第一。次日，廷珩奉特旨授翰林院检讨，入直南书房。”②

张廷珩，张廷玉堂弟，于雍正元年从考官子弟回避卷会试中式，殿试后，雍正帝欲拔置一甲进士，在张廷玉的请求下降为二甲第一名。雍正帝在授一甲进士官职时，特赐张廷珩检讨职，并令在南书房行走。

（二）雍正八年庚戌科：顾成天、胡宗绪二人

《雍正朝起居注册》记载：雍正八年五月初一日，大学士兼管翰林掌院学士事张廷玉等带领庚戌科一甲进士及考取、保举者共 97 人引见。奉旨：“周□、沈昌宇、梁诗正已经授职，其顾成天、胡宗绪学问素优，且有年纪，亦著即授为编修，免其教习，钟衡……等四十七人，俱著授为庶吉士。”③

《清世宗实录》记载：雍正八年五月初一日，雍正帝谕翰林院：“选拔庶常，原以作养人材。今科进士，特加考试，并命诸臣保举。除顾成天、胡宗绪，即授编修外，选取钟衡……等五十三人，俱著改为庶吉士。”④

可见，顾成天、胡宗绪由于学问素优，加上年纪较大，雍正帝没有将他们钦点为庶吉士，而是特授编修，并免去二人教习。这是雍正帝对他们的优待。

（三）雍正十一年癸丑科：张若靄、任启运二人

（1）张若靄

张若靄，张廷玉之子，雍正十一年进士，雍正帝将其钦定为一甲进士，并传谕张廷玉。张廷玉得知后，一再请求不要取录其子为一甲进士，雍正帝才将张若靄降为二甲第一名，并按榜眼、探花例，特授张若靄编修。“（雍正十一年）五月初二日，新科进士选拔庶吉士引见于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。上见若靄即降旨：‘张若靄原取鼎甲，著照榜眼、探花例授为翰林院编修。’”⑤

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二日，谕翰林院：“选拔庶常，原以作养人材。今科进士陈倓、田志勤、沈文镐已经授职，二甲第一名张若靄，著授为编修，张映辰……六十八员，俱改为庶吉士，分别清汉书教习。”⑥ 可见，张若靄不是庶吉士，而是由进士直接授职编修。

（2）任启运

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、《皇朝词林典故》、《词林辑略》三书均记载：任启运，江南荆溪人，散馆授编修，官至宗人府府丞。这三种书均将任启运放在庶吉士序列之中。

《馆选录》的初刻本在雍正十一年癸丑科张若靄、任启运二人的姓名上均加“编修”二字，而此科的庶吉士姓名上则均没有“编修”、“检讨”等字。可见，《馆选录》的初刻本认为任启运与张若靄一样，直接授职编修。《馆选录》续修本在张若靄、任启运二人的姓名上均无“编

---

① 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13，雍正元年十一月戊戌。

② 张廷玉：《澄怀主人自订年谱》，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，第 90 册，第 489—490 页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，1999 年。

③ 《雍正朝起居注册》雍正八年五月初一戊辰，第 5 册，第 3614 页，中华书局影印本，1993 年。

④ 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94，雍正八年五月戊辰。《清世宗实录》雍正八年五月戊辰所记是雍正八年馆选人数 53 人，而《雍正朝起居注册》雍正八年五月戊辰所记是这一天引见馆选的人数 47 人，五月初二、初四日从引见的进士中又选拔了 6 名庶吉士，共 53 人。

⑤ 张廷玉：《澄怀主人自订年谱》，第 90 册，第 538—539 页。

⑥ 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131，雍正十一年五月壬午。

修”二字，这给人张若靄、任启运是庶吉士之印象。

实际任启运并没有被钦点为庶吉士，而是直接授职翰林官。“荆溪任钧台宗丞，以雍正癸丑通籍，年六十四矣。殿试之明日，以能通性理八人引见，世宗皇帝反复下询，奏对详尽。蒙恩奖‘人甚聪明’，即授检讨，上书房行走。”①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一日，“谕内阁：今日诸臣进殿试卷，朕阅至第五本……又谕：任启运，授为翰林，在阿哥书房行走”②。雍正十一年五月初二日，钦定翰林院庶吉士。③ 可见，任启运在选拔雍正十一年癸丑科庶吉士之前已授职翰林官。

任启运，雍正十一年癸丑科第二甲第四十七名进士。清制，二甲进士入选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，三甲进士入选庶吉士，散馆授检讨。究竟雍正帝特授任启运为编修还是检讨？

雍正十一年九月十三日，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尚书事张廷玉等题请：“补充日讲起居注官事。……计开：侍读刘统勋、侍讲习寯……检讨任启运。”④

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，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尚书事张廷玉等题请：

> 补授中允事。该臣等议得右春坊右中允薄海补授司经局洗马员缺，准詹事府会同翰林院通共论俸将应升人员咨送前来，应照咨送开列具题，恭候皇上简用，臣等未敢擅便，谨题请旨。计开应升人员：编修李文锐，江南进士；编修李锦，江南进士；……检讨任启运，江南进士；编修张灏，顺天进士……

雍正帝批阅此份奏章之后，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降旨：“任启运补授右春坊右中允。”⑤

除以上两条史料外，《雍正内阁六科史书·吏科》还有多处记载“检讨任启运”⑥，因此，可以说雍正十一年，特授任启运为检讨，而不是编修。任启运在雍正十一年癸丑科散馆的前一年就升职为右春坊右中允。⑦ 总之，任启运是在中式进士后，于馆选之前，就直接授职检讨，并没有被钦点为庶吉士。

雍正年间，顾成天、胡宗绪、任启运三人没有钦选为庶吉士，而直接授职翰林，这既与他们学问好有关，也与他们的年龄相关。顾成天、胡宗绪中式进士时，已有年纪；任启运年已六十四岁。

（四）嘉庆十三年戊辰科：王服经一人

《词林辑略》卷五：王服经，“山东陵县人，免散馆，特授检讨。”《词林辑略》将王服经放在庶吉士行列。实际上王服经并没有被钦点为庶吉士，而是因中式进士时年高，特授检讨。据《词林辑略》统计，嘉庆十三年戊辰科有 76 名庶吉士，而据实录统计只 75 名庶吉士，其中就没有王服经。

嘉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，“引见新科进士，得旨：一甲三名吴信中、谢阶树、石承藻业经授职外，朱棨、陈官俊……王锡蒲（等七十五人）著改为翰林院庶吉士”⑧。嘉庆帝钦点的十三年戊辰科庶吉士中就没有王服经。

---

① 陈康祺：《郎潜纪闻二笔》卷 9《任启运受两朝礼遇》，《郎潜纪闻初笔、二笔、三笔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 年，第 493 页。

② 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130，雍正十一年四月壬子。

③ 《清世宗实录》卷 131，雍正十一年五月壬午。

④ 《大学士兼管吏部户部尚书事张廷玉题请补充日讲起居注官本》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·吏科》，第 73 册，第 126—128 页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，2002 年。

⑤ 《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张廷玉题请补授右春坊右中允本》，《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·吏科》，第 83 册，第 364—365 页。

⑥ 《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·吏科》一书多处提到“检讨任启运”，见该书第 74 册第 260 页、第 75 册第 42 页、第 81 册第 115 页、第 82 册第 599 页等处。

⑦ 雍正十一年癸丑科庶吉士于乾隆元年四月癸未散馆授职（见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17）。

⑧ 《清仁宗实录》卷 195，嘉庆十三年五月己亥。

嘉庆帝在引见新进士时就特授王服经为检讨。嘉庆十三年五月初四日，谕：

本科会试中式新进士王服经，年八十五岁，殿试三甲，文理清通。引见时看其精力尚健，洵为熙朝人瑞，伊即未经中式，亦例得邀恩赏给翰林院检讨衔，今若改用庶吉士，令其在馆学习，伊年已耄耋，词赋之学或非所长，且散馆授职转需时日。王服经，著加恩即授为翰林院检讨，以示嘉惠耆儒至意。嗣后如有中式进士年在八旬以外者，均著照此例行。①

嘉庆帝之意：王服经年八十五岁，即使会试没有中式，按例赏检讨衔；王服经中式三甲进士，为熙朝人瑞，加恩即授为翰林院检讨，免其在馆学习。王服经不算庶吉士。

总之，有清一代，二甲、三甲进士中没有被钦点为庶吉士，而直接授职编修、检讨的有：雍正元年癸卯恩科的张廷珩，雍正八年庚戌科的顾成天、胡宗绪，雍正十一年癸丑科的张若靄、任启运，嘉庆十三年戊辰科的王服经等六人。

四、其他途径入为庶吉士的人数

（一）因修书赏赐庶吉士的人数

乾隆年间因参与修《四库全书》，或校《四库全书》而被钦赐庶吉士的是九人还是十人？

《皇朝词林典故》卷55：乾隆四十年乙未科庶吉士最后一名是何思钧，将杨昌霖与其他修《四库全书》钦赐庶吉士的邵晋涵等九人，一同放在卷64《题名·特授改补官职》（应是“特授改补馆职”——笔者注）中。

续修《馆选录》将邵晋涵、周永年、余集三人放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庶吉士之后；将杨昌霖、侍朝、张能照三人放在乾隆四十年乙未科庶吉士之后；将胡荣、朱钤、吴绍灿三人放在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庶吉士之后；将程嘉谟一人放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庶吉士之后。《馆选录》（庶吉士名录止于咸丰六年、光绪十八年、光绪三十年等版本）这十人的姓名上均加“钦赐”二字。

《馆选爵里谥法考》卷4：乾隆四十年乙未科最后一名是杨昌霖。只将修（或校）《四库全书》钦赐庶吉士的邵晋涵等九人放在《国朝馆职补选爵里谥法考》中。

《词林辑略》卷4：乾隆四十年乙未科最后一名是杨昌霖。邵晋涵、周永年、余集、侍朝、张能照、胡荣、朱钤、吴绍灿、程嘉谟等九名钦赐庶吉士分别附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、乾隆四十年乙未科、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、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庶吉士名录之后。

可见，《皇朝词林典故》、续修的《馆选录》认为参与修（或校）《四库全书》被钦赐庶吉士的有邵晋涵、周永年、余集、杨昌霖、侍朝、张能照、胡荣、朱钤、吴绍灿、程嘉谟等十人，而《馆选爵里谥法考》、《词林辑略》则认为参与修（或校）《四库全书》被钦赐庶吉士的为杨昌霖之外的九人。这涉及杨昌霖是否是因修《四库全书》而被钦赐（特赏）庶吉士一事。

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，谕：

前据办理《四库全书》总裁奏请，将进士邵晋涵、周永年、余集，举人戴震、杨昌霖，调取来京，同司校勘，业经降旨允行。但念伊等，现在尚无职任，自当予以登进之途，以示鼓励。著该总裁等留心试看年余，如果行走勤勉，实于办书有益，其进士出身者，准其与壬辰科庶吉士，一体散馆，举人则准其与下科新进士，一体殿试，候朕酌量降旨录用。②

乾隆四十年四月，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科庶吉士散馆，参与修《四库全书》而特赐庶吉士的

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》，第13册，第220页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，2000年。

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：《乾隆朝上谕档》，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，第7册，第408页，档案出版社影印本，1991年。另见《清高宗实录》卷938，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戊辰。

邵晋涵、周永年、余集三人均授职编修。①

据上可知，邵晋涵、周永年、余集三人是以进士的身份而不是庶吉士的身份参加修书。由于“行走勤勉，实于办书有益”，特赐他们三人庶吉士资格，并参加壬辰科庶吉士散馆，授职编修。

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九日，大学士于敏中等奏：“请设四库全书荟要处总校官二员，将国子监监丞侍朝、候选内阁中书张能照充补，可否给与庶吉士衔，以示鼓励。从之。”② 可见，侍朝、张能照二人因校《四库全书》而被钦赐（特赏）庶吉士。据《词林辑略》等书可知，胡荣、朱钤、吴绍灿、程嘉谟等四人也是因校《四库全书》而被钦赐（特赏）庶吉士。他们分别参加乾隆四十年乙未科、四十三年戊戌科、四十九年甲辰科庶吉士散馆。

杨昌霖被授予庶吉士，虽与修《四库全书》有关，但他与邵晋涵等九人被特赏庶吉士有别。

乾隆四十年五月十四日，“内阁、翰林院带领新进士引见，得旨：新科进士一甲三名吴锡龄、汪镛、沈清藻已经授职，王春煦……何思钧，俱著改为翰林院庶吉士”③。

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四日，诏谕：

> 杨昌霖因在《四库全书》馆纂校书籍，是以钦赐进士，准其一体殿试。昨进士引见，该员甲第在后，而江苏省馆选者已多，是以未经录用。兹阅馆中所进，由散篇裒辑各书内《春秋经解》一种，编校颇见实心，即系杨昌霖所办，是其学问尚优。杨昌霖著加恩授为翰林院庶吉士。④

可见，在乾隆四十年乙未科馆选十天之后，杨昌霖被补点为庶吉士。他与邵晋涵等被钦赐（特赏）庶吉士有别。正因此，《词林辑略》等书对邵晋涵等九人均说明是因修（或校）《四库全书》钦赐庶吉士，而对杨昌霖的记载则是“江南吴县人，散馆改刑部主事”，将其与其他庶吉士一同对待。

总之，我们认为因修（或校）《四库全书》而被钦赐庶吉士的人数是九人而不是十人。

（二）由博学鸿词改为庶吉士的人数

有清一代共举行了两科博学鸿词，即康熙十八年己未博学鸿词、乾隆元年丙辰博学鸿词。康熙十八年己未博学鸿词取中人员均直接授职翰林官。乾隆元年丙辰博学鸿词，在乾隆元年考试取中的一等 5 人授职翰林官；二等 10 人，其中 5 人授职翰林官，5 人改为庶吉士。乾隆二年补试取中的 4 人，2 人授职翰林官，2 人改为庶吉士。

总之，由博学鸿词改为庶吉士的人数是 7 人。李润强统计：“清代庶吉士总人数为 6065 人，其中非进士出身的，如博学鸿儒、翻译进士等，共约 200 人”。而实际由博学鸿词和翻译进士改为庶吉士的才 50 人。李润强的统计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。

（三）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改为庶吉士的人数

明代没有官员改为庶吉士之例，清代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改为庶吉士的仅一例。

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五日，“户部堂官带领汉司官引见，奉旨：赵鸿猷、王式琬、孙见行、钱泓、程亮祖、王梦旭、章焞、胡振维、李湜、赵如升、屈模、袁志洁俱以原品休致，廖必琦改庶吉士，王麟瑞以御史用……”⑤

《词林辑略》：廖必琦，福建莆田人，“雍正甲辰（二年）进士，由额外主事改庶吉士”⑥。

---

① 《乾隆朝上谕档》，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，第 7 册，第 861 页。另见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981，乾隆四十年四月乙巳。

②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998，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壬子。

③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982，乾隆四十年五月庚申。

④ 《乾隆朝上谕档》，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四日，第 7 册，第 886 页上栏。另见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983，乾隆四十年五月庚午。

⑤ 《雍正朝起居注册》，雍正四年十一月初五日，第 1 册，第 848 页。

⑥ 《词林辑略》卷 10《特授改补馆职》。

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：廖必琦，福建莆田人，“甲辰进士，户部主事改庶吉士，授检讨，改监察御史”①。

据上可知，廖必琦，雍正二年甲辰科进士，授为户部额外主事，雍正四年十一月，户部堂官带领汉司官引见，一些官员休致，一些官员改职，而廖必琦改为庶吉士。对廖必琦来说，这是很幸运之事。有清一代，由进士出身的官员改为庶吉士的仅廖必琦一人。

（四）废科举之后授庶吉士资格的人数

废科举后，清朝将游学毕业生、大学堂毕业生优等者赏给进士、举人出身，然后对他们进行廷试，其中赏进士出身者或授职编修、检讨，或改为庶吉士，或以部属用。

据《词林辑略》统计，对赏进士出身者进行廷试之后，直接授职编修的 36 人、检讨的 29 人，改为庶吉士的是 49 人。而据《清实录》统计，对赏进士出身者进行廷试之后，直接授职编修的 38 人、检讨的 30 人，改为庶吉士的是 46 人。

废科举之后，改为庶吉士的人数究竟是多少？《词林辑略》和《清实录》均记载光绪三十四年、宣统元年、宣统二年选拔庶吉士的人数分别是 2 人、4 人、8 人。而宣统三年，《词林辑略》记载选为庶吉士的人数是 35 人，《宣统政纪》记载选为庶吉士的人数是 32 人。这涉及胡振禔、李成章、何炳麟三人是否是庶吉士的问题。《词林辑略》记载此三人，宣统三年选为庶吉士，而《宣统政纪》记载：宣统三年八月三十日，“引见北洋大学毕业生，得旨：胡振禔、李成章均著赏给进士出身，并授职翰林院编修，何炳麟著赏给进士出身，并授职翰林院检讨，张务滋、苏企由均著赏给进士出身，改为翰林院庶吉士，张寿祺著赏给进士出身，以主事分部尽先补用。”②可见，《词林辑略》记载有误，胡振禔、李成章、何炳麟三人不是选为庶吉士，而是分别直接授职编修、检讨。宣统三年，改为庶吉士的人数是 32 人，而不是 35 人。总之，废科举之后，改为庶吉士的人数共 46 人，而不是 49 人。

总之，经以上探讨，我们的结论：据《词林辑略》统计顺治三年丙戌科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的 5766 名庶吉士（包括 43 名翻译庶吉士）中，其中有 6 人在新进士引见时（或之前）就直接授职编修、检讨等翰林官，庶吉士王彦大致应是康熙三年甲辰科庶吉士黄彦博，陈瑄一人是否是庶吉士还难以断定，这样实际可能馆选了 5759 名庶吉士（包括补点为庶吉士的），也可能是馆选了 5760 名庶吉士。清代庶吉士总数可能是 5822 人，或是 5823 人（不包括明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在顺治初年改为庶吉士的人数），其中直接从进士中选出的庶吉士有 5759 人（或 5760 人），由博学鸿词改为庶吉士的 7 人，由进士出身官员改庶吉士的 1 人，因修（或校）《四库全书》而钦赐（特赏）庶吉士的 9 人，清末废科举后授以庶吉士资格的 46 人。

① 《国朝馆选爵里谥法考》卷 5《国朝馆职补选爵里谥法考》。

② 《宣统政纪》卷 61，宣统三年八月甲子。